

## 书评书介

## 文化移植与重建家园\*

## ——评《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

徐李颖

(厦门大学 历史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关键词] 华人社会; 民间视角; 文化移植; 本土化; 新加坡华人

[摘要] 近代以来, 在中国和东南亚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背景下, 中国的华南移民越过海洋抵达新加坡后重建社会与文化家园。在精英文化和上层制度缺失的状态下, 华人移民利用祖籍地的文化传统, 并以血缘、族群和信仰为纽带, 重新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华人文化, 并进一步完成了社群的整合与文化的重植。作者在《越洋再建家园》一书中选取了华人社会的本土视角与民间视角, 以历史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考察了新加坡华人社会从移民到定居转变过程中文化移植与重建家园的历程。

[中图分类号] D634.333.9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2-5162(2005)01-0071-05

## —

《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以下简称《越洋再建家园》,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3)是一本研究新加坡华人民间社会及其本土化的最新著作, 代表了海外华人本土化研究的一种趋势。

作者曾玲博士系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专治明清社会经济史。1994年移居新加坡, 任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研究员, 从事新加坡华人社会与文化研究。任职期间, 除了教学, 她还担任了多项研究计划, 如新加坡历史博物馆的“华人村落潘家村的调查研究”、“华商俱乐部怡和轩一百周年研究”, 新加坡华裔馆的“当代海外华人社团跨国活动研究”,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的“华人民间文化研究——以中元节为个案”、“二战后三十年华人宗乡社

团变迁”。还主持了“从宗乡组织看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本土化: 以新加坡广惠肇碧山亭的金石、档案资料为切入点”计划。2001年, 她返回厦门大学执教, 同时兼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特邀研究员, 继续研究东南亚华人社会文化的建构与发展。

在旅居新加坡的七年期间, 曾玲完成了从明清社会经济史到海外华人社会文化研究的转向, 并受到当地历史学家及台湾人类学家的影响, 开始以历史人类学的方法致力于新加坡民间社会及文化的研究。为了对新加坡华人社会组织、宗族文化、民间信仰等有深入的了解, 曾玲不辞辛劳地深入到各个会馆机构、庙宇组织、帮群坟山之中, 长期以参与者和观察者的身份往来于各个华人社会组织之间, 收集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包括政府档案、会议记录、专刊特刊、石刻碑铭等等, 而且留下了大量的调

[收稿日期] 2005-01-10

[作者简介] 徐李颖(1978-), 女, 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 本文经北京大学历史系梁志明教授审阅, 特此致谢!

查笔记和口述访问的记录。

2000年,曾玲与台湾著名人类学家庄英章教授合著了《新加坡华人的祖先崇拜与宗乡社群整合——以战后三十年广惠肇碧山亭为例》(台北:唐山出版社,2000)一书,这是其第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该书详细探讨了碧山亭以祖先崇拜来凝聚三属社群的文化及历史内涵,体现了新加坡华人社会在国家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调适能力与本土化趋向。<sup>[1]</sup>

2003年曾玲出版的《越洋再建家园》是在上述研究基础上的又一力作。作者把研究对象扩大到与华人文化相关的各个领域,如宗族、坟山、俱乐部、祖先崇拜、民间信仰、岁时节日、认同形态与跨国网络等,但贯穿不同主题的线索仍是华人文化在新的土地上重建和本土化的过程。无论祖先崇拜、帮权坟山还是商人的俱乐部,作者透过华人文化的不同方面,试图探讨的仍是华人文化在异乡怎样本土化以及利用何种手段本土化的问题。

本书是杨国桢教授主编的“海洋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之一。这套丛书以人类和海洋的关系为视野,将中华文明及华人文化放在海洋的背景之下,扩展中国史的研究范围与角度,重视华人历史与世界历史在海洋文明中的碰撞与融合。作为丛书之一,《越洋再建家园》同样是以中国东南沿海人民随着海洋流动向东南亚迁移的历史为背景和出发点,但作者着重探讨了中国沿海人民越过海洋之后面临精英文化缺失状态时以血缘、族群和信仰为纽带而进行的社群整合与文化移植过程。新加坡既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国,又是一个从移民社会发展起来的以华人文化为主体的现代化社会,以此作为海外华人社会的研究对象,对于深入认识中国海洋文明和华人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和多元特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 二

《越洋再建家园》共有九章。作者在“致读者”中,依照自己的研究思路把全书划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从1819年开埠迄今的近二百年,在近代以来中国和新加坡、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社会发展脉络下,华人社会伴随新加坡从殖民地时代到本土社会发展而经历

的历史变迁过程”(“致读者”第3页)。这也就是第一章的内容。作为全书历史背景的总体介绍,作者着重分析了19世纪末华人移民南来后,华人社会初步形成时的帮权特征、新加坡建国后华人社会的转型与调整以及21世纪在全球化时代华人社会面临的契机与再生。这三个连贯的时期是作者考察华人社会文化重建与变迁的重要历史背景。

第二部分是华人社会结构的考察,包括“聚族而居的潘家村”、“帮群坟山”和“怡和轩俱乐部”三章。这部分涵盖了三种不同类别的社会组织形式。潘家村是移植重建的宗族社会,帮群坟山是以方言群为组织方式的帮群组织,而怡和轩则是华商精英们的社团组织。这三种组织方式涵盖了从底层民众到商人精英的社团组织。通过这三个不同层面的社会组织在历史变迁中的不断整合可以看出,无论是商人精英团体、帮群会馆,还是底层民众无意识的宗族建构,都利用了祖籍地的文化传统,并根据当地社会的实际环境,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祖籍地文化进行了选择性的吸收和改造,这也是中华文化在当地一步步本土化的过程。

如潘家村,是从中国南来的潘氏族人以横山庙为中心聚族而居的村落。但是潘家村并非典型的中国传统式的宗族社会。因为海外移民无法举族迁移,他们在依照祖籍地的传统重建宗族之初,面临的宗族关系就是不完善的。在无法完全依赖血缘关系的情况下,潘家村人通过祖先崇拜和神明信仰合二为一的方式重新建构了自己的宗族组织。可以说,神明信仰弥补了血缘关系的不完善。在海外的华人移民社会,“祖先不是自然产生,而是人为的选择”(该书第57页),这种选择是华人维护和延续自身文化的重要手段。

著名人类学家Freedman等人认为,东南亚不存在华人宗族社会,宗族是无法移植的(该书第24页)。但作者通过对潘家村的深入研究,对这一结论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中国的宗族社会是可以移植的,只是在移植过程中因受到血缘关系不完善的影响而产生了变异,但本质上仍然是宗族社会;而且在建构宗族社会时,华人移民充分利用了祖籍地的文化

传统，如用神明信仰来弥补祖先崇拜的不足。

另一种华人组织是帮群会馆。“帮群组织”是殖民地时代新马华人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有关帮群社会已经有众多的学者做过研究，如林孝胜、颜清湟、陈育菘、陈荆和<sup>[2]</sup>等，这些研究的着眼点大部分都是帮群组织的社会结构及其社会作用。曾玲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另辟蹊径，在本书中透过华人社群对死亡的处理，从研究帮权坟山来看帮群组织对华人社会整合及认同的作用。曾玲的研究显示，在新加坡，坟山组织不仅是处理先人丧葬事务的组织，更是团结方言帮群的中心机构。二战后随着国家认同的逐渐建立，帮群坟山的管理逐渐打破了方言属的限制，面向全新加坡人开放。而这种趋势也改变了移民时代华人的认同形态，从起初的祖籍地认同到社群认同再到国家认同，层层叠加。

在新加坡华人社会，还有一类以有名望的社会翘楚为主的社会组织，那就是俱乐部。这些人不仅在经济上富甲天下，而且在社会领域也是维护华社利益的华人领袖。其中怡和轩俱乐部最有代表性。作者通过分析不同历史时期，怡和轩俱乐部在华社中扮演的各种角色及其发挥的社会作用，让我们看到，不仅是华人民间社会，即使是华人精英阶层，也在历史的变迁中经历着认同的改变和社会职能的改变，正如作者所言，“怡和轩俱乐部社会功能从领导力量、重要力量到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的赞助者的演化，是新加坡众多华人社团的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该书第134页）。

第三部分讨论新加坡华人民间文化中的祖先崇拜、民间信仰、岁时节日三种形态。作者在这一部分里主要探讨新加坡华人社会的精神文化。祖先崇拜是华人文化中最重要特色，它既代表着人们对死后世界的观念，又是人们借以维系生者世界种种关系的重要手段，更是文化传承的途径。在中国本土，祖先崇拜维系的是血缘关系内的人群；然而在海外华人社会，离开了中国传统的土壤，华人利用中华文化的资源，建构起的却是虚拟血缘的祖先崇拜，也即海外华人本土化了的祖先崇拜。这就是曾玲在“祖先崇拜”这一章里主要探讨的问

题。帮权组织通过社群总坟来建立“社群共祖”，“社群共祖”是超越了血缘的祖先，在华人社会，这样的祖先比单纯的家族祖先更具有凝聚力和整合力。这种变异也是中华文化在适应陌生环境中逐渐产生的。

“移神”与“移民”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因此在海外华人社会，民间信仰与祖先崇拜一样是华人精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更重要的是，民间信仰对早期华人社会的整合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因为早期的华人大都是自由移民，缺乏官方背景，更缺少政府行为的制度化的建构，华人社会只能通过民间的力量来建立自己的社会秩序。而且早期的殖民地政府实行的是分而治之的政策，华人社群基本上属于半自治状态。这种情况下，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庙宇组织就承担起了组织号召和治理民众的功能，一旦与帮权组织相结合，庙宇的功能便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早期的华人寺庙几乎都是集会馆、学校于一体的。二战后，庙宇的功能随时代发展而转型，更趋向于实用性和功利性，而神缘也取代了地缘和血缘的主导地位，成为整合华人社会的重要手段。

在“岁时节日”这一章，作者通过考察华人的几个重要节日，如春节、中元节和中秋节等，探讨了节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传承文化的功能。新加坡的华人节日基本上源于中国，在保留传统节日习俗的基础上，随着本土化的加深，又发展出了新的节日仪式和社会功能。春节的采青、中元节的庆赞活动、中秋节的社团庆祝活动在殖民地时代，承担着加强社团凝聚力的作用；而在新加坡建国后，这些节日又起到了打破社群界限、维护种族和谐的新功能。

第四部分考察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的跨国活动。这一部分内容比较侧重于最近二三十年来，冷战结束、中国改革开放并打开国门后的情况。一般认为，海外华人的跨国“宗乡活动”更多是强调祖籍地的传统乡土文化，但作者在研究中发现，当代的跨国宗乡活动实际上涵盖了祖籍地和移居地两方面的内容。而对祖籍地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认同并不影响他们对移居地的国家认同。这种认同方式

显示出华人认同的多元性及层层叠加的特性。

### 三

从研究方法看，本书有两点值得关注：首先是研究角度的“民间视角”和“自下而上看历史”的方法；其次是以海外华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中国为中心来看待华人文化的本土化。

新加坡作为中国以外华人居住密度最高的国家，在短短不到二百年的发展历史中，<sup>[3]</sup>经历了由移民社会到定居社会的形态转变及当地华人身份认同意识的转变。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文化形态，无论作为一种已经本土化了的社会文化，还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华人社会的延伸和发展，都有着特殊的历史和文化意义，它的重要性和研究价值已经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学者就已经把新加坡及其他东南亚华人地区当作研究中华文化的窗口。<sup>[4]</sup>如麦留芳通过对新马早期私会党的研究，写出了《星马华人私会党研究》<sup>[5]</sup>一书；50年代初期，Maurice Freedman利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对新加坡华人的家庭与婚姻做出了细致的调查，写出了《新加坡华人的家庭与婚姻》<sup>[6]</sup>。

20世纪70代之后，新马当地的学者对华人社会也展开了比较多的研究和讨论，如颜清湟的《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sup>[7]</sup>，林孝胜的《新加坡华人与华商》<sup>[8]</sup>，柯木林、林孝胜合著的《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sup>[9]</sup>，崔贵强的《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sup>[10]</sup>，颜清湟的《新马华人社会史》<sup>[11]</sup>，等等。这些著作作为新马华人社会历史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为新马华人社会历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对华人社会政治史、经济史或华侨人物史的关注是这些著作最大的特色，但同时，对于华人民间文化的历史研究就显得不足了。曾玲在《越洋再建家园》中就试图跳出华侨史的传统思路，采取了历史研究的“民间取向”和“自下而上看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华人社会文化。她根据自己多年来的田野调查和亲身参与，利用丰富的档案文件和实物资料，以民间文化为基点，考察了海外华人是怎样利用祖籍地的文化资源来建构新的文化家园的。

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李亦园教授曾经将

“华侨社会”比作中国的“文化试管”，因为世界各地的华侨社会或多或少地提供了中国文化在若干新“变项”下的“函数关系”，使得研究中国文化的人能更深入地了解其属性。<sup>[12]</sup>

“文化试管”的比喻其实是以中国为中心来看海外华人的视角。然而当海外华人逐渐本土化之后，完全以中国为角度的研究已经无法涵盖华人文化的方方面面。曾玲在《越洋再建家园》一书中试图建构一个以海外华人为中心的研究视角。这是这部著作在研究方法上的第二个特点，即把海外华人社会当作一个与中华文化有密切关系，却又完全独立的文化个体，以华人为视角来探讨华人文化的本土化。

华人文化虽然与中国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并不能将之简单地画上等号。考虑到海外华人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差别，当我们力求以“中国中心观”<sup>[13]</sup>的观点来研究自己的文化时，对于海外华人社会也应该尽量做到“华人社会中心观”的研究态度。以西方为中心或参照点的研究态度已经受到了史学界的批判，同样以大中国主义为中心去研究已经具备了独立形态的海外华人文化也是应该警惕的。

### 四

在研究内容上本书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首先，在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上，作者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潘家村的宗族问题、虚拟血缘的祖先崇拜、华人社会建构的地缘性主导地位以及华人认同的叠加方式等等。

通过潘家村的移植历史，可以看到宗族的移植不一定要举族迁移，在血缘关系不完整的状态下，华人可以利用祖先崇拜和神明崇拜合二为一的方式，以扩大了的血缘关系来建立宗族。因此，作者否定了宗族不能移植的论点。

在华人认同方面，王赓武教授曾经提出了“多元重认同”的观点。曾玲通过研究证明，华人的认同伴随社会历史变迁而形成层层叠加式的多重认同形态。所谓层层叠加是指华人不会因为姓氏认同而抛弃祖籍地认同，也不会因为祖籍地认同而放弃国家认同。华人会依据现实的需要利用不同的认同方式。作者在分析跨国网络的时候，指出正是因为祖籍地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并存，才形成了宗亲团体的跨国活

动。“全球化与本土化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向”（该书第308页），在这种形势下，华人的认同方式更有利于自身的发展。

作者提出的这些新观点是建立在对新加坡华人社会深入调查基础上的，不仅对研究海外华人社会，而且对研究中华文化的适应性和多元性也提供了新的范式。

其次，作者在书中对死亡的处理和祖先崇拜问题特别关注。

在本书中，作者透过华人帮群坟山的组织和运作，详细地探讨了与移民社会密切关联的祖先崇拜与死亡文化。华人移民在新的土地上面临的不仅仅是生存问题，还有对死后问题的处理方面。在中国文化中，因为对家族体系的重视，使得亡魂有着重要的地位。祖先肉体死亡，但其精神却代代相传，死去的祖先其实是整合和凝聚整个家族的力量。在移民社会，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华人“祖先”或“先人”概念已经发生变化，不仅仅是指与祭祀者有血缘亲属关系或“虚拟血缘”的死者，而且也向非血缘非同性的关系扩大，呈现出泛血缘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两类先人——社群先人和家族（家庭）先人的崇拜形态（该书第204页）。作者在书中探讨的这样一个亡者与生者的世界，是以往学者的研究中较少涉及的。但是因为章节划分的关系，作为作者研究中最有特色的这一部分，被分散在了不同的章节里。如果能辟专章论述先人崇拜与文化整合的关系，作者的观点也许会更加凸显。

总之，新加坡早期的华人社会是一个缺乏文化精英的移民社会，华人移民在新的土地上移植和重构自己的文化时，更多的是利用来源于祖籍地的文化传统与文化资源。在此过程中，华人文化也开始了本土化的历程。民间文化因而具有了相对重要的意义，肩负起了文化重植与社群整合的使命。要了解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发展变迁，民间文化是不可忽视的一环。《越洋再建家园》一书对于新加坡华人民间文化的重视与深入挖掘，以及“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研究方式，带给了我们更多值得思考的课题，为东南亚华人史研究作了有益的补

充，也为后来的研究者开辟了新的路径。

[注释]

- [1] 刘宏、郑平清：《评〈新加坡华人的祖先崇拜与宗乡社群整合——以战后三十年广惠肇碧山亭为例〉》，《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78-79页。
- [2] 林孝胜：《新加坡华社与华裔》，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年；颜清滢：《新马华人社会》，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陈育崧、陈荆和：《新加坡华人碑铭集录》，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2年。
- [3] 1819年，莱佛士（Stanford Raffles）登陆新加坡，宣布新加坡为自由港，实行自由贸易，吸引了大批商人和劳工。这一年成为新加坡开埠的起点，也是新加坡现代化历史的起点。参阅郑文辉著《新加坡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7年。
- [4] 20世纪50-70年代，傅利曼（Maurice Freedman）、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武雅士（Arthur Wolf）、葛伯拉（Bernard Garlin）等一批人类学家便开始通过海外华人社会对中国进行研究。
- [5] 麦留芳：《新马华人私会党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85年。
- [6] Maurice Freedman：《新加坡华人的家庭与婚姻》，台北：正中书局，1985年。
- [7] 颜清滢：《星马华人与辛亥革命》，台北：联经出版社，1982年。
- [8] 林孝胜：上揭书。
- [9] 柯木林、林孝胜：《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年。
- [10] 崔贵强：《新加坡华人：从开埠到建国》，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1994年。
- [11] 颜清滢：《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
- [12] 李亦园：《东南亚华侨的本土运动》，见李亦园著：《东南亚华人社会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85年。
- [13] 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兴起了“以中国人的角度来再现中国历史”的史学新浪潮，柯文（Paul A. Cohen）将这一史学动向称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参阅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新序》，《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